



“席地而坐”:意趣横生的文化沙龙

本报记者 冯桢 赵永宏



在云冈石窟,中央美术学院院长范迪安(中右)、云冈研究院院长杭侃(中左)与第五届青少年雕塑作品展参展小作者“席地而坐”,共话雕塑艺术。

2022第五届青少年雕塑作品展日前在大同市雕塑博物馆盛大启幕。这是由中央美术学院、中国美术家协会雕塑艺委会、中国美术家协会少儿美术艺委会、中国美术家协会策展委员会、大同市人民政府共同主办,中央美术学院雕塑系、大同市文物局、云冈研究院、大同市雕塑博物馆共同承办的雕塑艺术盛事。且不说雕塑作品琳琅满目,题材之广、想象之奇、技艺之新足以引人入胜,仅是嗣后一场研学活动,就足够出新出彩!

开幕当日下午,特别策划的“雕塑之城 对话未来”研学活动在云冈石窟景区进行。云冈石窟参观研学结束后,分享嘉宾及80余位参展小作者们在云冈石窟20窟前广场席地而坐,又开始了一场文化沙龙,讲述美育故事、成长故事,感悟云冈文化、雕塑文化。蓝天白云、清风旷野、绿树香花、佛窟石雕,怡人的风景中,步入美学之旅。沙龙上,中国美术家协会主席、中央美术学院院长范迪安就美育文化、雕塑艺

术、青少年雕塑的发展和未来进行分享互动;云冈研究院院长杭侃就云冈文化、石窟艺术、云冈石窟与青少年雕塑事业的关联与发展进行分享互动;中央美术学院原党委副书记、教授王少军就弘扬中华美育精神,对传统文化的继承和对文化的选择进行分享互动;中国美术家协会少儿美术艺术委员会副主任兼秘书长、中央美术学院教授郑勤砚以青少年雕塑大展的诞生与发展为主线,解码广大青少年雕塑创作的初心和意义。本次活动通过线下“雕塑沙龙”席地而坐和线上“艺术密码”直播课堂的形式同步进行,不仅现场观众反响热烈,同时在网络直播平台也备受瞩目,仅新华网就有42万观众在线观看,各平台共100多万人通过线上直播参与了本次活动。

让孩子们感到有意思的,不仅是云冈石窟的万千雕塑,“席地而坐”这种活动形式也使他们感到自在、新颖。“席地而坐”原为古人铺席于地以为坐。在中国上下五千年的历史长

河中,有大约3000多年的灿烂文明史,从文明史开始之时,“席地而坐”就已经出现在了古人的日常生活中,直到唐朝时期才逐渐退出历史舞台。不过,古代席地是跪坐,臀部压在脚后跟上,与跪的姿势相近。随着时代变迁以及“礼教”形成,“席地而坐”也变成了中华文明礼仪中的重要形式。大同市雕塑博物馆采用“席地而坐”的形式进行社教研学活动,这种新颖的形式不仅更加具有仪式感,而且能够拉近讲授者与聆听者的距离,增强亲近感与互动性,充分展现博物馆的包容性、互动性、公共性、服务性,更好地发挥博物馆研究、欣赏、教育的社会功能。

实际上,“席地而坐”不仅是古人的一种日常生活习惯,也是当时教学活动的主要形式。《礼记·文王世子》记述了孔子教学的情形:“凡侍坐于大司成者,远近间三席,可以问,终,则负墙。列事未尽,不问。《礼记·曲礼》:“若非饮食之客,则布席,席间函丈。”想必当时讲学时师生席地函丈,讲师也席地而坐。

历史典籍所呈现的教学情形,孔子或坐石头、或坐墩上,或师生设席于地相对而坐,弟子各捧简册,恭谨听讲。可见孔子当时的讲学情形是比较宽松的,这似乎与《论语》所记录的同学方式比较相符。

宋明时期的书院在建制上虽然仿制了宫殿的形式,但书院的兴起主要是不满科举对于学问探究的压制,而倡导教学与研究相结合。师生席地而坐,对话交流,仍为主要教学形式。如王阳明在稽山书院讲学时,“先生每临席,诸生前后左右环坐而听不下数百人”。《虞山书院志》记“会约”,亦谓听者“东西相向坐于地”。此外,由于书院教育面向社会,凡有志于学者,均可前往听讲,讲堂再大,也难以容纳,因此书院讲堂前大都有宽敞开阔之地,使讲堂的空间得以延伸扩大,以容纳更多人前来听讲。

由此看来,“席地而坐”是一种源远流长的教学沙龙形式。席地而坐,接自然之地气,沐智慧之灵气,无桌椅板凳之隔,拉近了人与人之间的距离,拉近了心与心之间的距离,带给人们健康、自然、平等、静心的感受。

大同市雕塑博物馆馆长张万军对记者说,以“席地而坐”的形式,他们已连续搞了近20期文化讲座、沙龙活动,诸如《“塑”说经典,走进雕塑》《绘画与雕塑的对话》《品读艺术典范》《寻找内心之美》等,主讲嘉宾大都是有一定专业素养的专家学者,听众则主要是青少年学生,或为社会各界人士,或为雕塑馆工作人员。未来,他们还将不断推出“席地而坐”这种形式的文化讲座、沙龙活动,使之成为有学术深度的美学讲堂,有文化思考的艺术探究,有大众口味的品牌塑造,有独特视角的文艺审美。请广大青少年和社会各界人士走进雕塑馆,走进文庙,走进更多名胜古迹,分享知识之美,感受文化之胜,一起努力把“席地而坐”打造成为一大城市文化品牌,为提高名城大同的文化品位做出贡献。

“微笑大同 最美笑脸” 有奖征集作品选登(17)



长城脚下,留下快乐与微笑。图为市京次文化创意传播中心的工作人员在拍摄微电影之余合影留念。 艳楠 摄



对于本土歌手阿郎来说,演出结束收获观众的鲜花与掌声是最快乐的一刻。 吕志强 摄

微笑大同

最美笑脸

有奖征集

主办单位

大同市委宣传部、大同市文明办
大同市直机关工委、大同市委网信办
大同市商务局、大同市城市管理局
大同市市场监管局、大同市文旅局
大同市行政审批服务管理局、大同市国资委

承办单位

大同日报社

协办单位

大同市摄影家协会、大同市新媒体协会
邮箱: fz80008@163.com

大同市旅游集散中心
Datong Tourist Transportation Center

旅游公共服务+农文旅融合

品牌赢天下 模式创未来

1.数字文旅的难点及堵点

数字文旅归结成一句话就是:将科技深度应用于文旅产业,提升行业的整体服务水平。而实现这一目标,依靠以商业为核心的互联网平台是远远不够的,需要旅游目的地政府找准方向,精心规划,大力扶持。

数字文旅难点和堵点不在于技术,而在于如何将技术渗透于产业的每一个毛孔,流淌在每一条毛细血管。

文旅产业涉及面广,产业链条长,各经营体信息化基础薄弱,各自为战,加之巨大的经营压力和保守的思维方式,决定了区域文旅产业的数字化改造无法通过自我进化或一纸政令等简单的方式达成。这是行业普遍问题,大同也是如此。所以,大同市数字文旅建设应该寻找一条政府、企业、市场紧密互动、有机结合的数字化文旅发展之路。

数字文旅 运营为王
——浅谈数字化文旅堵点及对策

2.应对之策

城市级的数字文旅发展,基础是要有城市量身定制的数字化智慧化平台。而有了这个平台,也仅仅是一个起步,最大的挑战在于如何将这套系统广泛地链接用户、链接资源、链接服务,形成数字文旅的商业闭环、服务闭环、政策闭环。

解决这个难题,需要从如下两个方面入手:

(一)政府为主导:在数字化文旅的建设过程中,政府主导非常重要,其一,政府有力量统一协调区域资源,制定相应政策;其二,政府主导的官方性有效地解决了面对游客的信用背书问题;其三,解决了商业平台无法提供的文旅公共服务问题和产业数字化起步的政策扶持问题。

(二)运营为核心:数字化文旅平台能够真正实现赋能产业,打通末端,首先需要一个既有公信力,又能提供公共服务,同时又具备市场化能力的运营主体,作为数字文旅运营机构。

其次,需要构建一个能够链接政策与市场的机制,采取技术位推广、政策性扶持、商业化运作三位一体的运营模式,一方面与政府互动,采集市场需求,提供决策依据;另一方面与市场链接,在为行业提供信息化、网络化的营销服务、政策服务的过程中,将数字科技传导至市场末端。只有政府与运营方充分联动,共同发力,才能使数字化文旅平台真正活起来、用起来。

第三,建设服务游客、服务行业、服务政府的数字文旅平台,该平台着眼点不能与民争利、与商争利,而应当是惠客利民、保业促商。因而,功能设计上除了游客感知的数字服务以外,重点是行业感知的渠道服务、营销服务和政策服务,让零散的经营体真正从数字技术中获利,实现科技赋能。

这一模式将数字文旅的运营摆在重中之重,是数字化文旅建设的核心点。以大同市智慧旅游建设为例:

由大同市文化和旅游局主导,大同市旅游集散中心开发运营的“畅游大同”小程序作为输出核心内容和公共服务的官方平台,运营方持续动态更新大同文旅的各项内容;同时运营方自主开发运营的“大同游玩总人口”作为对接市场的商业通道。通过双平台运作实现政府主导、企业市场化运营的模式。

平台除了必备的服务游客的小程序、公众号以外,着重打造服务于行业的B2B系统和异业分销系统,在技术上构建了客源地渠道方的采购端口和全民销售端口,可以将本地旅游产品的销售通过网络延伸到客源地,散落到全社会。

在运营上,通过客源地旅游推介会、社区推广、新媒体营销等方式,为旅游机构、旅游达人、网红等提供分销盈利手段,发放政府补贴和行业优惠,从而构建长期的宣传窗口和营销渠道,增强了旅游经营者的营销能力。

除此之外,大同市旅游集散中心以数字化技术为基础,积极推动成立大同市文旅产业联盟,线上线下推进农文旅融合等整合全行业的动作,极大地推动大同数字文旅的建设与发展。

孙文松

大同书城举办“开学季欢乐相伴”活动

本报讯(记者 赵小霞)走进坐落于魏都大道的“网红打卡书城”,典雅纯净的氛围扑面而来,这有着30年历史的大同书城引得不少读者慕名前来,“阅”读越欢喜,“阅”享越惬意。在新学期开学之际,大同书城与北京曲一线图书策划有限公司共同举办了“开学季53欢乐相伴”活动。

活动期间,读者不仅与53欢乐熊雕塑拍照合影,还收到了书店准备的伴手礼。

大同书城是晋北地区较大的民营书店,为读者找好书,为好书找读者,是其经营理念。书城独家承办了

九届大同读书节,为书香城市点亮一盏灯。如今,大同书城已经成为融阅读、休闲、研学、会务、活动等于一体的城市文化“会客厅”,成为我市有影响的“网红书店打卡地”。

据悉,此次活动为期一个月。

大同书城

购买教辅书,惊喜送给你

地址:魏都大道商医岗西侧

电话:2992388

大同市歌舞剧院

文艺创作表演 文艺交流策划
舞台造型策划 舞台设备租赁

地址:经济开发区柳营路樊庄文化产业园
QQ:345014025@qq.com
电话:0352—5375933

民间视听

抖音号: 76804949657

大同今昔对比

让城市留下记忆 让人们记住乡愁

大同素有“三代京华、两朝重镇”之美誉,三代分别是北魏、辽以及金。北魏道武帝拓跋珪于天兴元年迁都平城,至孝文帝迁都洛阳,共历六帝近百年,造就了历史上著名的北魏王朝,其改革也成为自赵武灵王“胡服骑射”后,大同地区的第二次民族融合。而辽金大同自辽兴宗升为西京之后,开启了大同历史上的第三次民族融合的高潮,关于五京之事也为人们津津乐道,那五京之制又是从何而来的呢?

一、辽金五京的渊源

《旧唐书》卷十八地理志记载“至德二年(757年)……十二月,置凤翔府,号为西京,与成都、京兆、河南、太原为五京。”可见,唐朝已有五京,不过此时的五京名大于实,唐朝长时间以长安为京畿,洛阳为都畿,不仅是全国政治、经济、文化中心,同时长安城也成为当时世界上最大的城市。此外,受唐文化影响



图为辽金元民族融合博物馆一角。

响深远的是由粟末靺鞨族建立的渤海国的五京制,其五京分别为龙泉府、显德府、龙原府、南海府、鸭绿府。耶律阿保机建立契丹后,于天赞四年(925年)东征渤海国,次年攻破上京龙泉府。

二、辽五京的形成

《辽史》卷一记载“唐天复元年(901年)……以太祖为本部莫离董……明年(902年)秋七月,以兵四十万伐河东代北,攻下九郡,获生口九万五千,驼马牛羊不可胜记。”此次攻伐为阿保机建立初步政权奠定了农业和手工业基础,以及融入先进的汉族文化。同年九月,阿保机便在潢河之南,建立了第一座城池——龙化州城。在此基础上,耶律阿保机于903年与唐河东节度使李克用会于云州(今大同),双方交换衣袍马匹,并约为兄弟。907年,阿保机设坛告天,即皇帝位。916年,在龙化州东筑坛,上尊号,建元神册。都城名为皇都。

天显三年(928年),辽太宗耶律德光为了进一步控制安抚原渤海国居民,将渤海居民迁至东平郡(今辽阳),并升东平郡为南京。

会同元年(938年),后晋皇帝石敬瑭为了报答契丹出兵扶植其建立后晋,“遣赵莹奉表来贺,以幽、蓟、瀛、莫、涿、檀、顺、妫、儒、新、武、云、应、朔、冀、蔚十六州并图籍来献。”在得到幽云十六

州之后,为进一步加强控制,耶律德光下诏以皇都为上京,府治为临潢府(因潢水之侧而得名,潢水即今西拉木伦河),又升幽州为南京,府治为幽都府(今北京),原南京改为东京,府治为辽阳府。上京、东京、南京合称三京。

1005年,辽宋签订“澶渊之盟”后,两国礼尚往来,通使殷勤,促进了宋辽之间的经济文化交流,统和二十五年(1007年),辽圣宗在奚王牙帐建立新都,号中京大定府(今赤峰市宁城县),并建由驿馆,用以接待北宋、西夏、新罗等国使节,中京大定府与原三京合称为四京。

辽开泰元年(1012年),改南京幽都府为燕京析津府,名称来自于“以燕分野旅寅为析木之津”。

重熙十三年(1044年),因辽境党项部族依附西夏,辽兴宗耶律宗真第一次伐西夏,结果在“河曲之战”被李元昊的军队打败,战后,辽兴宗出于控宋御夏的目的,将云州升为西京,府名大同。西京的建立提升了辽境西南地区的军事、经济影响力,至此,辽五京正式形成。

辽以五京为中心将全国划分为五个道,统辖东自大海,西至阿尔泰山,南至白沟的北方领土。五京的最高长官为留守,五京之间有联系也有区别,如东京重点在于管辖原渤海国的居民,南京则是作为与宋之间经济交往的桥梁,

重在赋财。西京则重在边防,云州原本就是军事重镇,从西京城的城池建设与官员设置可见一斑,《辽史》地理志记载“建西京,故楼、棚槽基。广袤二十里。门,东曰迎春,南曰朝阳,西曰定西,北曰拱极。元魏官垣占城之北面,双阙尚在。辽既建都,用为重地,非亲王不得主之”。《辽史》百官志记载“辽有五京……大抵西京多边防官,南京、中京多财赋官”。

三、金五京的形成

金代沿袭辽制,置五京。金初,完颜阿骨打起兵抗辽,于收国元年(1115年)建立金朝,在灭辽征战中,宋金达成海上之盟,按约定,西京及南京归宋所有(即原来的燕云之地),但金朝在先后侵占了辽五京后,仅将析津府交还了北宋,云州则迟迟未能交割,在此基础上,金改平州(今秦皇岛卢龙县)为南京,形成了新的五京。

金熙宗天眷元年(1138年),又“以京师为上京,府曰会宁,旧上京(临潢府)为北京”。

天德二年(1150年),海陵王完颜亮推翻辽南京的京号。

天德三年(1151年)三月,海陵王完颜亮下诏迁都燕京。这也是北京首次作为封建王朝的首都出现在历史舞台上,此后,元、明、清三代基本沿用北京为首都。

贞元元年(1153年),“改燕京为中都,府曰大兴,汴京为南京,中京为北京”。汴京即原北宋都城,今开封。南京的南迁也是金朝政治中心南移的具体表现。

大定十三年(1173年),金世宗完颜雍复以会宁为上京。至此,终形成了金代的六京制度,分别为上京会宁府、北京大定府、东京辽阳府、西京大同府、南京开封府以及中都大兴府。

贞祐二年(1214年),金宣宗完颜珣迫于蒙古军队进逼的形势,将金朝的都城从中都迁至南京开封府,并以洛阳为金昌府,称为中京。不过,金朝不久即在蒙宋的夹击下走向灭亡。

四、唐五京与辽宋五京的关系

唐、渤海的五京制在实际运行中往往是形式上的多京制,参与政务决策等事项是在其实际上的行政所在地,究其原因在于汉文化根深蒂固的民族宗法观念。不过前朝五京制度的形成影响了辽代五京制度的形成,但是辽五京在形式上与唐朝又有区别,辽朝的建立者契丹族是发源于西拉木伦河流域上游的游牧民族,“契丹旧俗,随水草,逐寒暑,往来游牧渔猎。”契丹人所住为毡帐,皇帝的御帐称为捺钵,辽建国后,皇帝四季外出游牧,朝官随行,政务皆在捺钵中处理。故辽五京在不同季节皇帝所处营地不同,都能成为国家的政务

中心。以西京为例,辽朝皇帝曾多次巡幸大同地区。982年,辽景宗乾亨四年“八月,如西京。九月庚子,幸云州”,病故于焦山行宫。辽道宗清宁八年(1062年),“癸未,幸西京。戊子,以皇太后行再生礼,赦赦西京囚”。

辽代的捺钵制度也为金人所习,金代在很长时间内都学习辽代的四时捺钵制度。与辽代的四时捺钵相比,金代的捺钵没有明显的“四时”之分,一般只分为春水和秋山两个系列,但是这种行帐制度却依然对五京的形成发挥着重要作用。仍以西京为例,世宗大定六年(1166年)“三月甲寅,上如西京。庚申,次归化州,西京留守唐括德温上谒。戊辰,至西京。庚午,朝谒太祖庙。壬申,击球,百姓纵观。五月戊申,幸华严寺,观故辽诸帝铜像,诏主僧瞻视之。壬子,诏云中大同县及警巡院给复一年。壬戌,诏将幸银山,诸寇从军士赐钱五万贯,有敢损苗稼者,并偿之。六月辛巳,太白昼见,经天。丙戌,发自西京。庚子,猎于银山。九月辛丑朔,至自西京。”

辽金五京制在政治上为游牧民族统治偌大的疆域提供了范本,有利于社会的稳定,极大地促进了民族融合。经济上,南北交流频繁,促进了契丹、女真的社会发展。同时在思想文化方面,五京也作为后世留下了许多珍贵的文化遗产,辽金遗存举世瞩目。

博物臻萃

